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

照那斯图

(JUNAST)

東京外国語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 Cultures of Asia &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990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研究文集

2
0

了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

I 研究文集

照那斯图

(JUNAST)

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 I 研究文集

平成2年3月30日

発行 東京外国語大学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東京都北区西ヶ原4-51-21
TEL 917-6111

印刷 株式会社 東京プレス
東京都板橋区桜川2-27-12
TEL 932-9291

© 1990 b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ILCAA)
Tokyo Gaikokugo Daigaku, 4-51-21
Nishigahara, Kita-ku, Tokyo 114, Japan

前 言

我的这部书分两册出版。现在奉献给读者的第一册，是我过去陆续发表的专题研究成果（有几篇与同事合作完成）。这些文章有的论述了八思巴字的性质、特点和结构体系，有的综述了八思巴字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有的介绍和研究了八思巴字的新资料，有的用八思巴字实际资料论证了专门问题。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出版，对于读者比较系统了解八思巴字的有关情况，可能有所帮助，同时作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对八思巴字进行研究，深入展开学术探讨，对作者文章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指正。

本书第二册“文献汇集”将全面介绍八思巴字蒙古语资料，其中包括国内外已经颁布的和笔者所搜集到的一些新资料。每项分六个方面：题解、原文照片、拉丁转写、相应蒙文、翻译，以及原白话译文。笔者现在正从事这方面的编写工作。

承蒙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邀请，我于去年九月三十日来到东京，担任该所客座教授，至今年九月三十日。借所帮我出版这部书之机，我要感谢前任所长梅田博之教授和现任所长山口昌男教授。我还要感谢中国研究部的中島幹起教授和中見立夫教授，以及涉外系的佐久間敬喜氏和岡田ほなみ氏。他们过去为我作了很多事情，到所后我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又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关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照那斯图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于东京

目 录

前 言

论八思巴字	1
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字形问题上的两种体系	9
八思巴字中的零声母符号	15
有关八思巴字母è的几个问题	23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	31
八思巴字	35
八思巴字研究	41
八思巴字研究概述	59
在南华寺发现一份八思巴字的新资料	67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	69
天宝宫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	81
关于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碑刻	87
元英宗格坚皇帝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 (英文)	93
关于《萨迦格言》最早的蒙译本及其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版本 (蒙古文)	99
关于孝经蒙文译本的几个问题 (蒙古文)	109
再论八思巴字蒙古语中的'ülu'u	117
《蒙古秘史》汉字音译本底本和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	121
八思巴字百家姓校勘	125

论 八 思 巴 字

照 那 斯 图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一种文字。八思巴字用于1269年以后的整个元代，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渐被废弃，成了死文字。八思巴字使用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作为“译写一切文字”的文字，译写了多种语言，记录了许多史实，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语言文字和历史资料，对于研究八思巴字本身以及有关语言和元代社会的情况都有重要的价值。到了近代，越来越多的人搜集和研究八思巴字资料，写出了许多论文和专著。但是，无论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我们的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展开。只有彻底研究八思巴字，才能获得对它的全面、正确的认识，而这样的科学成果又是其它有关学科利用八思巴字资料的前提。

现存八思巴字资料以我国为最多，其中不少资料尚未被利用。这是我们研究八思巴字的有利条件。本文主要就八思巴字本身的体系加以论述。其中若干问题，我们的看法与过去流行的观点不同，提出来讨论，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教。

一

八思巴字最初的正式名称为“蒙古新字”，后改为“蒙古字”。《元史》和其它一些史书的作者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国书”或“蒙古国字”，“元国书”或“元国字”。在近代，八思巴字又获得较为通用的两个名称：“方体字”（或译作“方块字”）和“八思巴字”（也作“八思巴文”）。前者是因它的字母体式呈方形而得名；后者则是因它的设计人是八思巴而得名。

二

为正式颁行八思巴字，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专门下了一个诏书。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①

在这个诏书里，蒙古皇帝说明了创制新文字的原因，规定了新文字的名称、用途，以及八思巴字的性质和地位。诏书里说八思巴字的用途是“译写一切文字”。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八思巴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我们知道，一般的文字只记录特定的语言，是特定语言的符号系统，但八思巴字却是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是用于多种语言的符号系统。现存八思巴字资料证明，当年用八思巴字译写的语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梵语、维吾尔语以及其它目前还不能确定的语言。从八思巴字的字母表和拼写法看，八思巴所设计的新文字反映了忽必烈在诏书里所说的“译写一切文字”的要求。八思巴字的字母总数比其译写的每种语言所需用的都要多一些，而且往往还用特定的字母组合来表示特定的语音。因此，它的字母

表具有适应多种语言的能力。制订八思巴字拼写法时,显然也考虑了不同的语言对象,并且在这些语言之间作了一定的平衡、折中,在一定的内容上各有适当的照顾。例如,八思巴字的行款和书写单位的确定,就是明显的例证。八思巴字的行款是从左方起,自上而下直写,书写单位是音节。显然,行款是顺从了来源于“畏吾字”的回鹘式蒙古文的习惯,既不同于作为八思巴字母基础的藏文,也不同于八思巴字所拼写的一个主要对象——汉文;然而,书写单位却沿用了藏文的传统,并且也与汉字的书写单位相吻合。

忽必烈在诏书里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八思巴字的地位,可是我们从他后来颁发的另一道诏书中对八思巴字名称的更改可以知道八思巴字作为国书的地位。我们在上引诏书里已经看到,这个文字被命名为“蒙古新字”。然而,时隔不久,在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忽必烈在另一道诏书里说:“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蒙古新字。”^②为什么要改换名称?这里没有明讲,其它文献中也没有直接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澄清八思巴字的地位。忽必烈当初所以把八思巴字定名为“蒙古新字”,显然是与当时在蒙古人中使用的“畏吾字”——回鹘式蒙古文相对而言的。因此与“畏吾字”相提并论的“蒙古新字”这个名称不仅同八思巴字的性质不相称,而且也没有明确反映八思巴字作为“国字”的地位,不合忽必烈的本意。很可能,从推行八思巴字所遇到的阻力中,忽必烈本人或元朝官方人士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蒙古新字”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误解为不过是蒙古人的文字,是替代“畏吾字”的新蒙文。人们也可能以此为借口抵制八思巴字在非蒙古人中推行。此外,从忽必烈所述创制新文字的动机,他对回鹘式蒙古文的称呼,以及推行新文字过程中对回鹘式蒙古文的态度看,忽必烈不仅不承认“畏吾字”是蒙古文,而且是极力排斥“畏吾字”的。这也可能是把“蒙古新字”改为“蒙古字”的一个原因。因为把八思巴字称作“蒙古新字”,实际上承认了“畏吾字”是蒙古字或蒙古旧字。而被改后的“蒙古字”则意味着八思巴字不仅仅是蒙古人的文字,也是蒙古汗国的“国字”。在“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的至元八年正月,忽必烈尚未定国号为元。^③因此,“蒙古”这个词在当时既是蒙古人的民族名称,又是蒙古汗国的国家名称。也就是说,“蒙古字”的含义,既是民族文字,又是国家文字。《元史》及其它一些史书的作者把八思巴字直接称作“蒙古国书”或“蒙古国字”,“元国书”或“元国字”,这是前人对“蒙古字”含义全面理解的实例,也是我们解释这个名称的一个有力证据。近代有人往往认为八思巴字只是元代蒙古人的文字,这是由于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蒙古字”而引起的误会。

如上所述,八思巴字的性质是特殊的,地位是高于各种民族文字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它除回鹘式蒙古文外,不排斥其它民族文字。诏书在说明八思巴字用途时所使用的措词是“译写”,而不是“代替”。诏书还明确地说行用八思巴字时“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可见,忽必烈大概没有用八思巴字代替其它一切文字的企图,至少在创制、推行八思巴字的初期是这样。

三

近代研究八思巴字的学者,由于各人所依据的标准、原则不同,提出的字母表互有差异,字母数目也不一致。我们认为,对八思巴字母表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而这个概念的确立应以原始字母表为依据。原始字母表,可以从有关文献记载中推求出来。明确记有八思巴字母总数或者同时还列出八思巴字母表的早期文献有《法书考》、《元史》和《书

史会要》等。尽管这些文献对八思巴字字母总数的说法不一：有说四十一的，有说四十三的；所列字母也有出入：或为四十一，或为四十二，但是，它们为探讨八思巴字原始字母表提供了可靠线索。

载有八思巴字字母表的《法书考》、《书史会要》、《新元史》，在字母表后都有如下的一句话：“汉字内则去×××三字而增入××××四字”。由此可见，这些文献所载八思巴字字母表不是专门用于哪一具体语言的字母表，而是当初设计的或当时公认的原始字母表。

在上述文献中所列字母或为四十一个，或为四十二个。如果加上“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则分别变为四十二个和四十三个，前者与四十一说不相合，后者与四十三说相合。由此可见，说有四十一个字母，而所列字母与此数相合的文献，没有包括汉字内“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指的是八思巴字的原始字母表；说有四十三个字母，而所列字母为四十二的文献，包括了汉字内“去三增四”而多出的一个字母，指的是用来拼写汉语而增加新字母的八思巴字字母表。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四十二个字母的文献中，比其它列有四十一个字母的文献多出的那个字母也是用于拼写汉语的专门字母的，除此之外的四十一个字母在各有关文献中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八思巴字原始字母表共有四十一个字母。

应该指出，在上述文献和其它一些有关著述里，八思巴字字母的写法，并不都很精确，有的甚至完全走了样。下面所列八思巴字字母的字体，主要以当时的官方文件原件和碑刻中常见的形式为依据。

八思巴字字母脱胎于藏文，大多数与藏文字母相同或相似，少数新造的字母也以相应的藏文字母为基础。下表把相应的藏文字母列于八思巴字字母后面，并附以文献中的注音汉字和我们使用的拉丁转写符号。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八思巴字母	𑖀	𑖁	𑖂	𑖃	𑖄	𑖅	𑖆	𑖇	𑖈	𑖉	𑖊	𑖋	𑖌	𑖍	𑖎	𑖏	𑖐	𑖑	𑖒
藏文字母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ཏ	ཐ	ད	ཌ	ཎ	པ	ཕ	བ	མ	ཙ	ཛ
注音汉字	葛	渴	哏	端	者	车	遮	倪	怛	挑	达	那	钵	焚	末	麻	穆	擦	惹
转写符号	k	k'	g	ɣ	ɕ	ʈ	ʈ'	ɳ	t	t'	d	n	p	p'	b	m	c	c'	j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𑖓	𑖔	𑖕	𑖖	𑖗	𑖘	𑖙	𑖚	𑖛	𑖜	𑖝	𑖞	𑖟	𑖠	𑖡	𑖢	𑖣	𑖤	𑖥	𑖦	𑖧	
𑖨	𑖩	𑖪	𑖫	𑖬	𑖭	𑖮	𑖯	𑖰	𑖱	𑖲	𑖳	𑖴	𑖵	𑖶	𑖷	𑖸	𑖹	𑖺	𑖻	𑖼	
噶	若	萨	阿	耶	罗	设	沙	河	法	哑	遐	霞	耶	高	伊	郭	翳	污	也	恶	
w	z	z'	y	r	ʃ	ʂ	s	h	f	'	q	ɣ	ɳ	ɰ	i	u	e	o	e	(待定)	

在八思巴字字母表中，只有第41号字母“恶”未见用于具体语言的实例，其余都见于八思巴字文物资料。

八思巴字字母表的第1—33号字母为辅音字母，第34号和35号字母为半元音字母（只作介音），第36—40号字母为元音字母，第41号字母的性质有待研究。

八思巴字字母表应用于具体语言时，除用一个字母表示一个语音外，有时还用双字母表示一个语音。例如，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ö、ü 用 eo、eu 表示，或者说在相应的阳性元音字母 o、u 前面加字母 e 表示；汉语的 i 用 -hi 表示，或者说在 i 前面加 h 表示。

四

八思巴字的拼写法原则有两种：一是语音学原则，一是传统原则，译写语言时分别使用。据我们现在所知，八思巴字对蒙古语和汉语用的是语音学原则，即根据这两种语言的实际口语拼写它们的语音；对藏语和梵语用的是传统原则，即完全根据这两种语言的书面形式一地对一地转写它们的字母。因此，对藏语和梵语而言，八思巴字无所谓拼写法，本文所说的八思巴字拼写法只适用于蒙古语和汉语。

五

八思巴字里没有表示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元音 a 用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具体说，下述几种书写单位中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以下略作零形式）都表示 a：

（1）每个单写的辅音字母后的零形式，例如，d = da “打”（汉语），z r = zara “月份”（蒙古语）；

（2）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例如，hy = hay “海”（汉语），'l t'n = 'al - t'an “金”（蒙古语）；

（3）两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中后一个辅音字母为·时，每个辅音字母后面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 nu = ga'anu “皇帝的”，u l' = ula'a “铺马”；

（4）三个连写的辅音字母之间的零形式，其中居中的辅音字母为·时（也只见于蒙古语），例如，g'n = ga'an “皇帝”，j'n = ja'an “象”；

（5）半元音字母后的零形式（只见于汉语），例如，gi = gia “家”，giy = giay “佳”，yu = yua “华”，yuy = yuay “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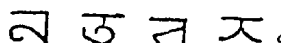
（6）辅音字母和yi之间的零形式（只见于蒙古语），例如，'yi mg = 'ayimag “部落，同族”，y bu t'u cyi = yabut'ucayi “走吧”。

六

第31号字母'本身不表示什么音，是用在字（词）首元音前面的零声母符号。'后没有元音字母或半元音字母时，根据上述规则，则表示 a 的存在。在蒙古语里用'作零声母符号时，跟它相拼的元音字母有 e，以及由 e 作第一个成份的复合字母或复合元音。例如：'er di ni = 'erdini “宝”，'eol jee t'u = 'öljeet'u “完者都（元成宗名）”，'eu bul = 'übul “冬季”，'euè led = 'üèled- “作”。在汉语里用'作零声母符号时，元音字母有以 e 为第一个成份的复合字母和以 u 为韵头的韵母，以及复合韵母 uè。例如：'eu = 'ü “玉”，'uŋ = 'uaŋ “王”，'uen = 'uen “元”，'uin = 'uin “韵”，'uè = 'uè “危”。

有些研究八思巴字的学者认为'是表示字（词）首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这是不符合八思巴字字母的表音体系的。如上所述，在八思巴字里没有表示元音 a 的专门字母，元音 a 是用零形式表示的。'作为元音前面的零声母符号，在体系上属于辅音字母。因此，应该说表示元音 a 的不是字母'，而是'后的元音字母的零形式。

七

在有关八思巴字字母表的史料中，元音字母 i、u、è、o 的形体为 。

八思巴字的研究者一向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元音字母，并且解释为词首形式，进而把与它们相对的另一一些形体解释为词中、词末形式。波普（N·Poppe）在《方体字》一书中所附的元音字母表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典型代表。^④波普共列了二十一种形体，其中包括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用于蒙古语的两个双字母，也包括我们认为零声母符号的'。波普说明他的第33号字母o（本文39号字母）时写道：“第33号字母与其后面的辅音字母结合时要用连接符。”^⑤可惜，他并没有把第33号字母里的“|”同其它元音字母中相同的东西联系起来，把自己从第33号字母中得出的看法贯彻到底，相反，仍然把“|”当作元音字母本身的笔划，提出了元音字母多体说。据我们的研究，有关八思巴字史料中所写上四个元音字母的形体，以及波普等人当作元音字母原体的那些形体，实际上并不是单纯的元音字母。换句话说，不是独体形式，而是元音字母加其它书写符号的合体形式。我们在研究八思巴字拼写法时发现，在作为八思巴字书写单位的音节形式（单由一个辅音字母构成的音节除外）中，除字母本身外，还有两个书写符号。一个是横线“—”，一个是竖线“|”。“—”表示元音字母在字（词）首的地位，“|”表示同一个书写单位内的各要素的联系。我们把前者叫作“字头符”，后者叫作“连接符”。字头符与元音字母发生关系，是元音字母的附加符号，只用于处在字（词）首的元音字母上。连接符是音节各要素，即字头符、元音字母、半元音字母、辅音字母之间的附加符号，用来连接同一个音节的各要素，一般用在右侧，只有o与字头符或其它字母相连时，u与字头符相连或在已与字头符相连的u后又有其它字母相连时，连接符才用在整个字体的中线上。例如：

inu “他的” (蒙古语)	nigen “一个” (蒙古语)	u “五” (汉语)	k'un “人” (蒙古语)	urt'u “长” (蒙古语)
olon “多” (蒙古语)	onggoč'as “船(复数)” (蒙古语)	éne “这个” (蒙古语)	t'én “天” (汉语)	harban “十” (蒙古语)

我们通过对八思巴字书写单位诸要素的分析，得出了八思巴字元音字母原体的形式。这些原体形式可以从作为八思巴字来源的藏文中找到根据，证明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原体形式同相应的藏文元音符号完全相合（八思巴字的是藏文的倒置）。为什么史料中记载的上述四个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形体不是我们所拟定的那样四个单纯形体，而是同字头符和连接符相结合的那种写法呢？我们认为后者是自成音节的写法，正如藏文的元音符号自成音节时，或者说进入书写单位时不写作、、、，而写作一样。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八思巴字的字头符是藏文的代用符号。八思巴字的元音字母处于字（词）首时，其上必用字头符或零声母符号'，其中i、u、é、o上用字头符，e上用零声母符号。因此字头符实际上也是一种零声母符号。说得更确切些，字头符“—”是用于i、u、é、o四个元音字母前的零声母符号，'是用于字（词）首元音a和元音字母e，以及半元音字母u前的零声母符号。下面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证明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具有相同的功能。按照前述的一般规则，处于字（词）首的é上应该用字头符，但是，也有用零声母符号'的，如蒙古语“宝”又作'értini；处于字（词）首的u上应该用字头符，但是，也

有用零声母符号'的,如汉语“危”作'uè。后者所以这么写,而不写成带字头符的u,可能是因为如果用带字头符的u,在连写中就出现问题,即“危”势必写作𐰇,而è同其它字母连用时连接符只能用在右侧,所以在韵母uè上改用了零声母符号'。这虽然是个别的例外现象,但它表明字头符和零声母符号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八

八思巴字的行款是从左方起,由上而下直写,书写单位是音节。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对汉语而言,相当于一个汉字;对藏语而言,等于藏文的一个音节;对蒙古语而言,复杂一些,有时等于一个音节,有时等于两个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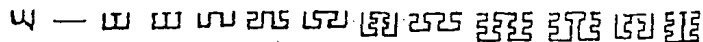
拼写蒙古语时,八思巴字的音节结构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随着附加成分的添加而变化的。如果附加成分里有元音,就引起词的末一个音节结构的变化。例如:č'e-rig“军人”,č'e-ri-'un(<č'e-rig+un领格附加成分)“军人的”,č'e-ri-'u-dun(<č'e-rig+ud复数附加成分+un领格附加成分)“军人们的”。

由于八思巴字的书写单位不是词,八思巴字又没有标点符号,所以词与词的界限,句子与句子的界限,只能靠上下文来判断。

八思巴字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例如,波普在《方体字》一书中写道:“八思巴字是音节文字,它的每一个辅音字母不仅表示一个辅音,而且表示由该辅音和元音a构成的整个音节。”⑥不错,在八思巴字里辅音字母(还有半元音字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音节,读与元音a相拼的音。但是,问题在于元音a是用什么表示的。我们说,元音a不是由辅音字母表示,而是由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的。因为,a也由辅音字母表示的这一说法不符合八思巴字的字母体系和表音方式。八思巴字的字母有元音和辅音的区别。表示元音a的零形式,实际上也和其它元音字母一样是独立的音素,与其它元音字母相对立,代表一个没有写出来的a。所以,我们认为八思巴字不是音节文字,而是音素文字。

九

八思巴字的字母有三种字体:楷体、篆体和双钩体,以楷体和篆体为常见。篆体专用于印章和碑额。它是在楷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笔划与相应的楷体字母存在一定对应关系,但在结构上比楷体复杂得多。这是因为一个楷体字母可以有多种篆体形式,而这些篆体形式有的包含对称花样或多层结构,像汉字的“九迭篆”。例如,楷体字母y,据我们现在所见实物,有下列十一种篆体:



关于八思巴字的篆体字母、书写原则和结构特点,作者将另文介绍。

十

八思巴字从正式颁行的1269年起,到统一的“大元”灭亡的1368年,始终作为元朝的国字广泛应用于官方文件。这是现存的碑刻、印章、牌符、钱币等各种文物所证明了的。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在现存文物中有一方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省左右司之印”,背面刻有“天元五年六月 日中书礼部造”⑦等汉字。天元五年为1382年。这方官印说明,直到所谓北元时

代，八思巴字仍被官方使用，而从八思巴字演化而来的一种独特的篆体符号系统，作为藏文的转写符号，在喇嘛寺院中一直用到近代。

我们知道，蒙古皇帝为了推行八思巴字，使八思巴字“传布永久”^⑧，发布了一系列的“圣旨”，采取了许多行政措施，其中包括给八思巴字的学习者以优厚的待遇，如“免一身差役”、“授以官职”^⑨等等。然而，八思巴字始终未能普及，更未能“传布永久”，随着元朝的灭亡，它也逐渐被废弃不用了。八思巴字所以成为死文字，有社会原因，也有文字本身的原因。八思巴字是蒙古统治阶级为自己在政治上的需要而创制的，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没有基础，因而，新文字的支撑者——元朝政权垮台，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这就是八思巴字被废弃的社会原因。八思巴字是“译写一切文字”的特殊文字，它的拼写法是以平衡、折中多种语言对象为原则制订的，因此对每个具体对象而言，它并不完全适合，在不同方面上不同程度地脱离了具体对象的特点。而且，作为八思巴字书写对象的蒙古、汉、藏等语言，当时都有自己传统的超方言的文字。这些超方言的文字对自己各种方音的适应能力远远胜过八思巴字。八思巴字经不起同这些传统文字的竞争；终于成为死文字。这就是八思巴字被废弃不用的自身的原因。

注 释

① 《元史·释老传》和《元典章》卷一诏令条。

② 《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条。

③ 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是至元八年十一月，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七，第138页。

④ 波普：Квадратн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1年版，第33页。在1959年威斯巴登出版的该书英译本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中（第24页）原封不动地刊载了这个八思巴字元音字母表。

⑤ 同上俄文版，第33页。

⑥ 同上俄文版，第35页。

⑦ 详见拙作《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北京，第77页印38，图六：10。

⑧、⑨同注②

（原载《民族语文》1980年 第1期）

八思巴文元音字母

字形问题上的两种体系

照那斯图

八思巴文有五个元音字母：𑖅[i]，𑖆[u]，𑖇[é]，𑖈[o]，𑖉[e]。还有两个半元音字母：𑖊[ɥ]和𑖋[i]。在八思巴文的书写法中也用双字母表示某些语音，其中包括元音和辅音，例如蒙古语的阴性元音 ö 和 ü，分别用𑖉与𑖆的组合即𑖉𑖆 eo 和 𑖉与𑖆的组合即𑖉𑖆eu 表示。

八思巴文对元音 a 不设专门字母，用零形式表示。所谓元音 a 的零形式是指与其它元音字母相对而对立的零形式，因为其它元音都有专门的字母。下面一组例子中括弧里的 a 就原为零形式：

bi	我	k'ij(a)^(a)r	边陲	bu	不	cuč'in	三十
beye	身体	k'en	谁	bogd(a)s	圣人	goy(a)r	二
bō'ed	全部	k'öndelen	横的	büt'un	完整的	k'üč'un~k'üč'ün	力量
b(a)g	花园	g(a)j(a)r	地				

但是，表示 a 的零形式，是有条件的。即：凡处在书写单位（八思巴文以音节为书写单位）首位的辅音字母（包括零声母符号）和半元音字母的后面没有元音字母时，这个零形式就表示 a。例如：z(a)-r(a)“月份”，d(a)“打（汉语）”，'(a)l-t'(a)n“金”，h(a)j“海（汉语）”，gi(a)“家（汉语）”，gi(a)j“佳（汉语）”，vū(a)“华（汉语）”，vū(a)j“怀（汉语）”，'(a)yi-m(a)g“部落”，y(a)-bu-t'u-g(a)yi“走吧”（动词命令式）。

还有，凡处在书写单位末尾的零声母符号“'”（前面的元音为 u）之后的零形式也表示 a。例如：lu^(a)“同（后置的）”，ur-gu^(a)-su“如果长出来的话”，bo-lu^(a)-su（也有 bo-lu-^(a)-su）“如果成的话”。在这里“'”实际上成了复元音 ua 的标志。不仅如此，零声母符号“'”还是长元音的标志。如果在同一个书写单位里，直接出现在另一辅音字母后，而后面又再没有任何元音字母时，它就是长元音 aa 的标志，例如：u-l(a)^(a)=ulaa“乌拉，差事”，j(a)^(a)n=jaan“大象”。如果其后还有某元音字母时，则它是与那个元音相对的长元音标志，例如：d(e)^e-re=deere“上面”，g(e)^en=geen（蒙古书面语 kemen）“说，曰”，d(u)^ul-g(a)-guè=duulgaguè“宣谕的”。

半元音字母用于汉语，作介音，并用于对藏文的转写。

五个元音字母中，e 从来不出现于词首，其余四个既可出现于词首，也可出现于非词首（即词中或词末）。由于它们在词中所处地位有词首与非词首的不同，因此进入书写单位而与其它字母或书写符号结合时遂各自表现出不同特征，从而在书写法上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对这个体系的认识，研究八思巴文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以八思巴文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尼古拉·波普教授为代表的传统看法中，在所有元音字母形体里实际上已包括了其它书写符号。于是，传统看法不仅把元音字母的字形与其它书写符号搅在一起，而且无助于揭示八思巴文的元音字母进入书写单位时形成的特殊规律。下面笔者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看法，同时也一并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就正于大方。

波普教授把上面所列元音字母与其它一些书写符号结合的形式，即元音字母在书写单位中的独写形式（历史文献中所载八思巴文元音字母的形式），看作是单纯的元音字母字形本身，并且解释它们为词首的形式，同时把另一些形式与之相对，解释为词中的形式，这样他对八思巴文元音字母共列出二十一种形体。我们为了讨论的方便，把波普的表格转引如下①

	Initial	Medial	
31	ᠠ	—	a
32	a ᠡ b ᠢ	c ᠣ d ᠤ	o
33	ᠦ	ᠦ	u
34	ᠨ	ᠨ	e
35	a ᠢ b ᠣ	c ᠣ d ᠣ	é
36	a ᠨ b ᠨ	c ᠢ d ᠢ	ö
37	ᠨ	ᠨ	ü
38	ᠢ	ᠢ	i

对于波普的这个表格的内容，我们首先要说的是，如果依照波普的体系，还得作一些补充，例如在33号字母的词首形式中应该增加一个 ᠦ，实例见后面5页的 urt'u “长，永久”和 umsus “牦牛”。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波普表格具体内容所反映的观点和结论，我们不能不提出以下几点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一、31号字母不是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而是用于词首元音前的一种零声母符号（它的功能和用法我们将在下文详述）。把31号字母认为是词首元音 a 的专门字母，这种观点背离了八思巴文严密而科学的表音体系和书写法体系以及字母系列体系。具体说，它割裂了 a 一律用元音字母零形式表示的表音体系，割裂了词首元音一律用零声母符号作为书写标志的书写法体系，混淆了辅音字母和元音字母的区别。

① N. Poppe: THE MONGOLIAN MONUMENTS IN HP'AGS-PA SCRIPT, 1957, 威斯巴登。

二、34号字母从来不在词首出现。波普在其专著英文版的词汇索引中，共列有三个所谓 e 出现于词首的词，即 ebdere(‘esu)、egil、eldeb（见原书122页）。有些学者也不断利用他的材料作为 e 出现于词首的例证。遗憾的是，前两个词完全搞错了，词首字母恰恰都不是 e，而是 è。ègil “俗人、平民”一词在忽必烈皇帝龙年（1280或1292年）所颁发的圣旨里出现过两次（第30行和31行）；在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年）圣旨里也出现过一次（第34行），写法都是一致的。èbdere‘esu “如果坏了的话”，见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兔年（1351年）二月二十八日圣旨（第29行），也清楚地证明是 è。至于“eldeb”（各种）一词词首元音的写法，虽然不是像上面两个词那样无可置疑地是（è），但有理由确认它不是 e，而是 è。事实上匈牙利的李盖提教授对此已作了修订。尽管他没作任何说明而转写作 è，也许他以为无需说明^①。日本的服部四郎教授也赞同李盖提的看法^②。我在这里不过是补充一下订正的具体理由。上述表示“各种”意义的那个词，大家很熟悉，见于居庸关六体文字石刻，只出现一次，它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𐰣。认为它是𐰤的人说其右侧的那个竖线条笔画不应该有，认为它是𐰥的人说其左侧的那个竖线笔画不应该有，显然不能仅靠这半斤八两的理由说服对方。但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可以提出决定性的根据，那就是在下面横线笔画正中下方有一个向右倾斜的短笔画，这种笔画恰是 è 所具有的，而 e 是没有的。据此可以确定，这个词词首的字母不是 e，而是 è。此外，大家知道，居庸关石刻的拼写蒙古语的八思巴文为诗体文。汉文诗押尾韵，而蒙文诗联头韵，每段诗句行首词的语音要相互和谐，语音相同。“各种”这个词所在那一段四行诗的首音均为 è，请看：

èjen bodhisiwid-un 'alt'an joric č'iq-un t'ulada, 由于佛主金光闪闪的意志，

（主人）

èldeb k'eregud t'egus бүт'у'ен č'abč'a'al dot'ora, 在居庸关圆满造就了一切，

（各种）

è'uri urt'uda bayicu-yin č'ila'un k'urus-iyer, 以永久屹立的坚石，

（永远）

ène supurvan-i 'ülü uda'ulun t'egus бүт'у'ebeyi. 迅速建起了这座塔。

（这个）

由此看来，对于这个词首字母写法上的争议，显然是由于石刻的笔误所致。从现已发现的八思巴文资料中之所以找不出一个 e 出现于词首的例子，这是因为在八思巴文的拼写法中 è 与 e 的分布是互补的：前者只出现于词首和特定的几个复元音结构中，后者只出现于其它条件下（关于 è 和 e 的关系，笔者将另文阐述）。所以，可以认为，所谓34号字母的词首形式根本就不存在。

三、35号字母 a 和 b、c、d 是同一个字母的异体。如果把那些不同文件、出自不同的人的书写风格上的差异算作不同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远不止于这几个，如在居庸关六体文字的石刻中，无论拼写蒙古语还是译写梵文的八思巴文石刻中，è 在笔画结构和走向上就有好

① L.LIGETI: MONUMENTA LINGUAЕ MONGOLICAE COLLECTA III, MONUMENTS EN ÉCRITURE 'PHAGS-PA. PIÈCES DE CHANCELLERIE EN TRANSCRIPTION CHINOISE, 布达佩斯, 1972, 参阅第95页。

② 服部四郎：关于八思巴文 e 与 è 字，《蒙古学情报与资料》1985，3/4期，64—71页，武·呼格吉勒图译自日本《言语》1984 第7、8月号。